

梅忆

文/梁冰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我在陪同梅兰芳先生慰问南海前线人民解放军时,曾系统观摩过他的全部经典剧目,每戏必看,每看必带着他著作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相互对照。他的好友许姬传先生发现了我的这个“秘密”并告诉了他。一天演出后,我和他同车回到驻地,照例在他房间里小坐,他突然问我:“听说您每天上剧场都带着我的那本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,一边看戏,一边同书上写的对照,是吗?”我点点头。他说:“您这么看重这本书,真是难得的有心人。不过以后可别这样了。比如《宇宙锋》,虽然是我平生下功夫最深的一出戏,但我从来没有满足过。写这本书的时候,戏的好些地方还没有改好,今晚的表演,比书上写的就改动了不少,已经不完全是一码事了。兴许您明天看的,跟今天的又有了不同。戏,就是要不停地演,不停地改,不停地出新,才能永远对得起观众。”后来,我发现事实确如梅先生所说。其实,何止《宇宙锋》,他的所有剧目都是如此,或小改,或大动,或删繁,或增益,甚至由于表演上的再创造,重新解释了人物,使主题起了质的变化,化腐朽为神奇。

梅兰芳早在青年时期就编演过反映当时社会现实、揭露社会黑暗的时装新戏《孽海波澜》、《童女斩蛇》、《一缕麻》、《宦海潮》等,在京剧表现当代生活方面作了勇敢尝试。1915年他才21岁时,就大胆革新,做到唱念做舞并重,让观众从单纯的“听戏”发展到“看戏”,不但满足了听觉上的享受,也满足了视觉上的美感。他还改进音乐、唱腔和板式,调整乐器配置,丰富了声腔艺术和乐队伴奏,并创造性地革新旦角的化妆和服饰,丰富和美化了舞台形象。

晚年编演《穆桂英挂帅》时,他在家里的大穿衣镜前面反复揣摩,大胆吸收了青衣、花旦、刀马旦、小生、武生

甚至文武老生的一些表演程式和身段,兼收并蓄,天衣无缝。他的艺术实践,验证了一条重要原理:“移步不换形”。“移步”,就是不固步自封。“不换形”,就是尊重艺术规律,保持京剧的美学特征。1956年,梅第二次来南京演出之后,顺道回故乡泰州寻根,由当时的江苏京剧团副团长江贻君陪同。途经扬州时,贻君向梅介绍了扬州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,从富春的翡翠烧卖、千层油糕到大麒麟阁的京果粉、京江脐;从素有儒商之称的扬州盐商对戏曲的贡献到四大徽班进京;从扬州八怪到郑板桥的道情十首;从南朝宋人殷芸的“腰缠十万贯,骑鹤下扬州”到唐代诗人杜牧的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,无不使梅先生为之动容。后来,我和贻君每到北京出差,都要到护国寺甲一号看望梅先生,每次都受到他和夫人福芝芳的热情接待。贻君儒雅的风度和谈吐,给梅留下了深刻印象,梅家上下都亲切地称这位“江团长”为“扬州才子”。

其实梅兰芳的艺术成就,正来自他对读书求知及文化修养的重视。他对古典文学、诗词歌赋等都有着广泛的兴趣,他为中国戏曲研究院讲授《游园惊梦》时,能对汤显祖的原著进行详细分析,提出许多精辟见解。他在《洛神》中扮演的甄后,让观众看到了一个“水佩风裳,姿容绝世”的洛川女神形象,具有超凡脱俗的“仙气”。不少演员演《洛神》,都做到了形似,唯独缺少这股内在的“仙气”,主要原因就在于自身的文化修养不够。

回忆与梅先生的交往,不能不产生由衷的感慨,明白了何以欧阳予倩赞他为“伟大的演员,美的化身”,何以爱森斯坦给了他“最伟大的造型大师”的高度评价。■

怀母二题

文/王慧琪

题一幅日照

那应当是一个夏日的午后,母亲穿了一件极普通的府绸短袖,那衣衫至少穿了有几年,原本蓝茵茵的色彩已被洗得很淡了。她端坐在那张朝南的平时有阳光洒进来的书桌旁,桌面上摆放着父亲关于植保机械的书稿。母亲的钢笔字清秀,娟静。她退休后的好多时光就这般在为父亲默默誊写书稿中度过。

照片里的母亲,眉宇间似有若无地流出一抹浅浅的笑。头发留得不长,惜已基本花白。她50岁上下头发就渐渐往白里走了。

母亲那淡淡的笑容里,分明传递出一种随遇而安的自足与温婉。她大半辈子生活的地方并非故乡,为了家她选择留在了这座城市。几十年里经历过不少周折,包括在几处乡村学校较长时期的逗留和辗转。但母亲的生活态度一直都是达观的,很少听到她抱怨过什么。

那一天,母亲投向镜头的目光,除了一份快慰,感觉还有一种让人心酸的坚定。母亲一生养育过八个孩子,体能的透支不言而喻。到了晚年,她不仅消瘦,骨质疏松症也相当严重。尽管出门总小心翼翼,但还是让人骑车给撞了。骨折了的腿脚被敷了石膏,吊了牵引,可病榻之上,她却能强忍疼痛,自寻其乐地哼唱年轻时学来的京剧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等唱段。

母亲离开我们快十七年了,这幅日

照摄于她70岁那年。事先并无什么准备,爱好摄影的妻子在我们回乡的那天下午,近乎神来之笔地抓拍了这个镜头——把母亲最真实也最传神的形态留给了这个世界。

没有围墙的学校

母亲在那所乡村中学呆了有十几个年头。时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

当时的校舍比较简陋。教室与教室间的隔断,像是用毛竹片将几层芦席夹紧,外面糊了一层黄泥。因此课堂里的喧闹几乎是可以互传的。

学校四周没有围墙。不多远便是农田。教师宿舍的路边,栽了不少的树。再往前去,是池塘。夏季来临,荷叶铺展开来,沁出一片凉意;入夜后,那蛙声此起彼伏地响着,使学校变得格外幽静。

印象中那时常停电,母亲批改作业,会借助煤油灯的光亮。有时觉得亮度不够,把灯芯捻一捻,那火苗突然蹿上来,好几次燎焦过母亲额下的发丝。

母亲是个英语老师。农村孩子觉着学这个一点用没有,上课时秩序也就很差。她也只有对几个稍有兴趣的学生尽点心了。若干年后,有两位当年的学生专程来看她,说起母亲那时教书的艰难,师生都有点忍不住擦了眼泪。

在我十来岁的光景,曾几次随母去那所校园小住,因此那些影像会时常浮现于脑际,而始终挥之不去。■



藏
摄/谈钢

夏天种树

文/王明皓

地铁站修好了,入口处一大块地皮,就好像是从远古洪荒那边扔过来的,乱石废土遍地,野草长得有一树高。看样子,这里少不得要修个广场了。果然汽车卸来了土,推土机又轰隆隆着再将它们推平。土干了后,好像又在上面积了一层沙,而后就铺上一块块的草皮,再用板子把这草皮拍拍实,绿茵茵的一大片草坪,就这么给种出来,拍出来了。

不久地铁通车了,草坪不过是权宜之计,这个广场又开始重修了。

重修好的广场,全以灰色的花岗岩石块铺成。广场上横着种的是香樟,竖着栽的是银杏,都是大树,横横竖竖就将这广场分成了若干块。这就可想象着将来的秋天,香樟是深沉浓烈的绿,银杏是鲜明灿烂的黄,黄绿相间,有横有竖,便如一首格律工整的诗。但这广场上的石块铺好,又在空出的地方种树的时候,就离夏天不远了。夏之将至,又种的是大树……到时人出汗,现在却要先为这棵树们捏一把汗了。其实何必那么急呢,不是还有明年吗?但要种树的人们似乎不理这一套,刨好了巨大的坑,又开来了威武雄壮的吊机,依然是轰隆隆地鸣响着将大树们凌空吊起,又毅然决然地将它们放进了坑里。

树就这么栽下去了。

面对既成事实,我也就这么想,如果这厚石板铺成的广场夏天不种树,那么就会给人以大漠戈壁的感觉,中午上面是能烤熟鸡蛋的。如果这广场上尽种的是小树,巨大和渺小相聚,就会

给人一种搞笑的感觉。再说,这广场上的树如果不种得大些,特别是银杏,它要长到哪年才能把这里一方天,给撑起来啊?

但一个铁的道理就摆在那里,夏天种大树,大树一死,一切岂不等于归零了么?

其实多虑了。不就是怕夏天种树会被太阳晒死吗?现在有的是办法,低矮些的植物,只要在上面遮上一层黑色的纱帘,再勤浇些水就可以了。高一些的如香樟广玉兰之类,遮起纱帘不算,再加个水泵把水化成了雾喷出来,成日云雾笼罩,香樟广玉兰们也会乐不思蜀,不会想不开的……但银杏树,却叫种树的人遇到了麻烦。

这银杏树有十几棵,因树冠的巨大,种下后怕倒下来,又为它们支撑起铁架子,开来了洒水车,在每一棵根部都灌水。如人所愿,不久无数个绿蒙蒙的小芽,就把银杏树那粗壮的树干包裹了起来。可是叫人不忍看到的情况接踵而来,天晴了,遇着太阳一晒,小芽芽们就立即萎了下去。种树的人不敢怠慢,每天早上都开来了洒水车浇水,这回不是浇根,而是倒过来从上往下浇,一个劲地向树顶上喷水。浇了两天见不行,就准备为这银杏树罩起纱帘,喷水作雾了。可试了试才发现,这些银杏树就像是太高太大的新娘,虽美丽,纱巾却总也是围不到她们头上去的。于是真急了,来了好多人围在树下,都在仰头看它们的梢,而后又低下头,对着它们的根指指点点的……

第二天这些银杏树就都挂

水了。一包药水捆在树身上,一只针头戳进树干里。这年头生病,人挂水,原来树也是可以挂水的。水挂了几次,银杏树上那些萎下去的芽,就又挺拔了起来,居然都被救活了。

我走近去看那装着这神奇药水的塑料袋,药水的名字不大好记,名字下面印着几个字“挂贵,不挂更贵”,却叫我记忆尤深。

这明显是句广告词,写得却既有哲理,又颇有调侃的意味。一字不提钱,却处处是经济。“挂贵,不挂更贵”,却叫我记忆尤深。忽地发现我们天天看这满眼是绿的树,还就是从来没问过这树的价钱,遂向为树喷水的工人一打听,才知道这一棵大银杏树的价格,“少说也值个两万三万的了。”

一针下去就能叫价值不菲的树们起死回生,夏天种树的底气,原来在这里。

这座城市是有着许多这样的广场的,早晨或黄昏漫步其间,我们享受着绿树浓阴,姹紫嫣红,香飘四季,说到底还真和这夏天种的树,和这为树挂的药水,有着很大的关系……■